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旅欧华侨

李明欢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二次大战; 华侨; 欧洲

[摘要] 据中华民国侨务部门1935年的统计, 当时旅居欧洲的华侨近4万人。然而, 时至30年代末, 当战争乌云在欧洲大陆上滚滚翻卷之际, 上万欧洲华侨为免遭战祸, 匆匆回国。因各种原因而留居欧洲的华侨, 与欧洲人民一起在漫天战火中度过了六年的艰难时光。本文追溯旅欧华侨在二次大战期间艰苦而顽强的求生历程, 并展示旅欧华侨与欧洲人民共同抗击法西斯而留下的一页鲜为人知的华章。

[中图分类号] D634.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1)04-0049-09

###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Europ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I Ming-huan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 words:** the Second World War; overseas Chinese; Europe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provid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ROC in 1935,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Chinese who were making their living in Europe at that time was near forty thousand. When the war was approaching in Europe, more than ten thousand Chinese rushed back to their hometown. Those Chinese who stayed in Europe had shared their hardship with the European people for as long as six years. This article has outlined the Chinese immigrants' experienc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oreover, a study has been made on how the Chinese immigrants fought against the Fascists together with European people.

### 一 逃离战乱

据中华民国侨务部门1935年的统计, 当时旅居欧洲的华侨约有3万8千多人。<sup>[1]</sup>当战争乌云在欧洲大陆上滚滚翻卷之际, 生活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华侨, 为免遭战祸, 赶紧收拾行装, 匆匆回国。

[收稿日期] 2001-01-03

[作者简介] 李明欢(1953-), 女, 福建厦门人,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博士, 主要从事华侨华人研究。

1939年年初，浙江瑞安白门乡共有99人在欧洲谋生，到同年9月大战爆发时，已有44人仓促离开欧洲返回家乡。由于白门人移居欧洲的高峰期是在1934到1936年之间，因此，大战爆发前，他们大多才到欧洲三、五年，仍处于艰难的立足阶段，多数人仍然两手空空，身无余钱，有位叫曹顺昌的村民，出国时借了600银元当路费上路，回国时连还债的钱都还没能挣够。在匆匆回国的白门人中，除两人带了钱回乡买地买屋之外，其它人带回的只是一个破碎了的“欧洲梦”。<sup>[2]</sup>当战火燃起之后，留居欧洲的44名白门人中，有2人不幸死于战乱，24人因求生太过艰难，不得已在大战期间又陆续回国。<sup>[3]</sup>同期前往欧洲的浙江温州丽岙人，情形也与白门人相似。30年代中期前后抵达法、荷、意三国的302名丽岙人中，到1940年5月，已减少到67人，其中旅居法国的丽岙人由战前的281人减少至52人，旅居意大利者由战前的11人减少至3人。<sup>[4]</sup>大批华侨落魄归乡，是整个40年代“出国潮”在上述地区销声匿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德国华侨较早就感受到了生活的沉重压力，尤其是潜在的战争威胁。1935年时，德国纳粹政府曾经颁布过一项以“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为前提的婚姻法，规定德国人不得与有色人种结婚。1938年，该项婚姻法正式适用于旅居德国的中国人。有些受“种族优越论”迷惑的德国人，到德国秘密警察处报告他们所知道的中德同居者。秘密警察一接到此类报案，立刻严厉进行查处：德国妇女一方将被劝告离开其中国伴侣，而中国人一方则可能因此遭到关押入监或送入集中营的严厉惩罚。<sup>[5]</sup>一些好端端的中德家庭因此被强行拆散，有些中德夫妻因此不得不赶紧逃离德国，例如，当时已在德国建立了家庭的中国进步人士王炳南就只能选择与其德国妻子一起匆匆离开德国。<sup>[6]</sup>德国入侵波兰后，1939年12月，二百多名不愿继续为德国法西斯工作的华侨海员集体辞职，乘意大利邮船经新加坡回国。次年2月，又有420人离德返国。大战期间，先后离开德国返回中国的海员、难侨及学生共777人，这是旅居德国的华侨对德国法西斯的无声抗议。<sup>[7]</sup>

## 二 艰难谋生

在纳粹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下，侨居德国的华侨进步人士也受到严厉的监视甚至公开的迫害。与德国共产党有过公开交往的中国女共产党人胡兰畦被投入了纳粹的监狱，另一位中国人程远也被德国法西斯认定犯有“危害国家的言行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sup>[8]</sup>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曾积极领导欧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并与当地反法西斯运动领导人关系密切的王海镜、雷子声等人，相继被德军逮捕关入集中营，从此杳无音信。荷兰抗日救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志南，在荷兰沦陷后仍秘密协助反法西斯战士工作，于1942年不幸被捕入狱，失去自由一年多，出狱时已病魔缠身，不久就去世了。

大战前在柏林有一家十分著名的中餐馆“南京饭店”，老板是一位广东籍华侨，在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后，这位老板因为反对法西斯的倒行逆施，被害遇难。<sup>[9]</sup>1944年5月13日，德国纳粹盖世太保借口华侨从事间谍活动，突然派出大批警察到汉堡和不来梅华侨聚居区搜捕华侨，在汉堡逮捕华侨128人，在不来梅逮捕华侨近40人。纳粹当局将这160多名华侨强制押送到富斯布特区（Fuhlshütten）集中营内强迫服劳役。他们中只有一部分人熬到1945年英军占领汉堡，才获得释放。<sup>[10]</sup>

连天的战火，使许多华侨死于非命。德国入侵波兰时，浙江青田籍华侨王岩波亲眼看见自己的同乡周罗、尹保林、徐显贵等七人被德国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他本人藏身于地道内，方幸免于难。<sup>[11]</sup>

大战期间，还有许多华侨被德军抓去当苦力，修工事，筑炮台，运弹药，受尽磨难。浙江文成籍华侨胡昭卿 1931 年去意大利，一直在意大利的小城市靠当小贩谋生。1939 年 10 月，胡昭卿在街上卖货时突然被意大利警察抓住，不由分说立刻被押送到附近的山上修工事。到了山上，他发现已经有好些华侨被抓到那里当苦力了。后来，他们几个人设法将身边余留的货物贿赂看守的警察，逃出了“警戒区”。1943 年 4、5 月间，胡昭卿在米兰卖货时，和胡子荣、胡玉卿、张福春等同乡一道，又被抓去做苦力，修工事。好在他们几人相互帮忙，以身患传染病为由，骗过了看守的警察，逃出了虎口。<sup>[12]</sup>

浙江籍老华侨，如胡克林、潘元禄、麻国昌等人，在回忆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时，也谈到自己曾经被迫去为法西斯占领军当苦力，九死一生。胡克林记得，德国占领荷兰后，食品越来越紧张，饿得没办法，听说去德国人的工地当苦力可以填饱肚子，他就去了法国西部的一个德国军事基地当苦力，前后近一年，虽然拣了一条命，但已瘦得皮包骨头。<sup>[13]</sup>潘元禄是 1937 年去法国的，1940 年法国沦陷后，潘元禄和十多位浙江同乡一起被迫到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为德军当苦力。由于正是两军对阵时期，盟军的飞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飞来轰炸德军的军事目标，他们天天冒着炮火硝烟干活，担惊受怕，朝不保夕。<sup>[14]</sup>

大战爆发之际，欧洲一些华侨仍然选择留居当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历经多年辛劳后，刚刚在欧洲的土地上多少建立起自己的事业，舍不得弃之不顾。然而，他们中许多人的家业，或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或被法西斯占领军全部没收。前文提及的那位波兰华侨王岩波，虽然从德军的轰炸中死里逃生，可是，他从 1932 年起苦心经营多年的副食品商店却被法西斯占领军没收了，多年积蓄付诸东流。

浙江温州籍华侨任岩松，1933 年到法国。1939 年春，他拿出自己多年辛苦积蓄的一点钱，与同乡潘方顺，还有一位犹太人三人合股在巴黎二十区开设一家小五金厂，由于产品适销对路，获利颇丰，其雇佣工人很快就增加到三十余人。可是，正当三位股东筹划着进一步拓展业务时，战争爆发了，先是由于社会混乱，人心惶惶，产品严重滞销，接着，德国占领法国，五金厂被德国占领军没收。任岩松等人顿时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不得已，他们只能再度走上街头，靠沿街叫卖为生。<sup>[15]</sup>

1939 年大战爆发前，浙江丽岙华侨在法国巴黎、里昂、马赛等地共开了三家百货店和三家皮革工场，其中，由张岩林、张朝光、林岩甫等人合伙在马赛开设的一家百货批发店经营货物已达数百种，由宋银者等人在巴黎开办的皮革工场因生意逐步兴隆，开始雇佣工人帮忙。可是，由于大战爆发，这些商店、工场相继倒闭，刚刚起步的事业全部破产。<sup>[16]</sup>

前后长达五年的战争，造成欧洲食物严重短缺，老华侨们说起当年求生的艰难，还记忆犹新。有位老华侨在回忆中写道：1940 年德国占领荷兰后，“所有财物及粮食给法西斯强盗抢劫一空，汽车不用讲，连旧的脚踏车都拿去了。城市居民没有粮食吃……1943 年起，粮食贵到不得了，一包香烟荷币十五元，一斤洋芋二、三十元，一条面包五、六十元，一斤小麦六、七十元，一包牛油二十五元，最后有钱人家一条面包贵到一百五十元买来吃……德军侵占最后一年里，全荷兰贫民饿死很多”。<sup>[17]</sup>

据一位法国沦陷之初仍在里昂“中法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忆：德国法西斯侵占法国之后，责令法国傀儡政府为德国占领军提供给养，因此，大部分食用物品都被德军征去，法国全国饥馑，民不聊生。外国穷学生的情况更为艰苦，由于数年长期挨饿，营养严重不足，有的学生年纪轻轻牙齿就脱落了，有的整日头昏眼花，根本无法坚持正常学习。1942 年 11 月 11 日，德军占领里昂“自由区”，位于该区内的“中法大学”的中国学生被限定在

48 小时内离校，顿时流离失所。<sup>[18]</sup>

在德军对英“空中闪电战”的地毯式狂轰烂炸中，英国主要城市均遭受严重破坏，利物浦和伦敦唐人街处处断壁残垣，英国华侨的财产、住房等损失惨重。1940 年秋，在日夜不停的防空警报中，伦敦“中国餐馆大东楼听说还逞强开着，中国水手公寓的人也没移动，但华侨洗衣坊却大多关了门，至少 12 个华侨已葬身在这场闪电战中了”。<sup>[19]</sup>

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欧洲华侨以顽强的毅力，千方百计谋求生存。荷兰华侨在荷兰沦陷后组织的“华侨互助会”是为华侨互助互帮，共度难关的例证之一。荷兰沦陷之后，曾经活跃多时的“荷兰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被迫停止活动。为了使留居荷兰的侨胞能够继续保持联络，共度难关，依据当时中华民国驻荷兰使馆公使撤离荷兰前所提建议，抗日救国会的一批骨干成员决定成立“华侨互助会”。互助会的新会所设在抗日侨领张振英开在海牙的“华胜洗衣馆”内。鉴于荷兰华侨以广东人、浙江人为两大主要地缘群体，因此，互助会选举张振英为广东人代表、陈彬为浙江人代表，共同担任该会主要负责人。互助会成立后，常有华侨上门求助，因此，曾经担任过荷兰华侨会馆荷文秘书、来自荷属东印度的华裔冯尧阶，和另一位也是来自荷属东印度的华裔知识分子陈善谟一起，主动担任志愿人员，为大家服务。为慎重起见，互助会还聘请了一位法律顾问，即来自荷属东印度的华裔法学博士施锡仰（西文名 Sie Joen Kan）。他们不畏艰险，为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而四处奔走，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最受称道的当数如下两桩：一是代表当地华侨向德国占领当局提出给华侨配给大米的要求并获得批准，二是据理力争使得 65 岁以上的华侨老人得以免除繁重的劳役。然而，由于好些华侨常在互助会进进出出，渐渐引起了德国占领军的注意。1943 年初的一天，互助会的法律顾问施律师正在该会处理会务时，突然闯进一群德军，将施律师强行逮捕，并搜查会所，查抄了所有文件及私人财物，同时宣布禁止互助会的一切活动。

由于战争隔断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正常联系，许多留居欧洲的华侨与家乡亲人断绝联系长达四、五年。有些华侨在无望之际，曾向瑞士国际红十字会总部发去“探询敌后方亲属状况”的请求书。<sup>[20]</sup>大战结束之后，一些人发现战乱已使他们永远失去了自己最亲的亲人，他们因此而在心理上所受的创伤，终生难以平复。

一位老华侨的女儿曾对笔者谈过她父亲在大战期间的遭遇。她的父亲是在 1934 年离开家乡到欧洲谋生的，当时，女儿只有三个月。离家时，他告诉妻子，只要赚到钱就回家，希望妻子好好养育孩子，照顾父母。初到欧洲时，父亲时不时地会寄钱回家接济家中生活。但是，1940 年后，家中就得不到父亲的消息了，母亲忧虑成疾，不久即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可是，远在欧洲的父亲对此一无所知。直到 1956 年，父亲设法与家里重新联系上后才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他非常伤心。尤其在晚年，他常对女儿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你的母亲。”

另一位荷兰老华侨陈先生，原籍中国福州，1939 年离开家乡，辗转多处，战后在荷兰定居下来，待他好不容易与老家重新建立联系时，才得知全家包括妻子女儿等 11 人，已在日寇轰炸福州时全部遇难。当他在 1987 年对笔者说起这段伤心的往事时，仍然痛心不已，他说道：“如果我不出国的话，他们肯定不会遭难，我知道哪里可以躲炸弹，我会帮他们找到安全的地方……我这一生的事业一直不顺，全是报应啊”。从他的言谈中，谁都能感受到他心灵上沉重的负疚感。

在战乱中，出于求生的本能以及身为移民而表现出的特殊的适应能力。当最初的战火过去之后，部分华侨渐渐地在被侵略军破坏了的经济环境中寻找新的经济机会，并尝试能够适

应客观环境的创业可能。战争改变了欧洲原有的经济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善于见缝插针的欧洲华侨以新的机会。

在法国，本来做皮革生意的主要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由于二次大战期间德国大肆迫害犹太人，皮革业受到严重摧残。这时，一些旅居法国的中国人开始进入这一行业。例如，前文提及的潘元禄，离开德军的军事基地后，于1940年初辗转到了巴黎，经介绍进了同乡潘可寿的皮革工场做工。由于当时市场上民用小工业品紧缺，这家工场生产的小皮夹、小皮包等价廉物美，获利颇丰。半年后，掌握了制作技术的潘元禄与人合股，另开了一家小皮革工场，产品的销路也相当不错。1943年4月，潘元禄从两人合股的皮革工场中分出，再单独开设一家新的皮革工场。他从采购原料到设计加工，处处精打细算，每天工作16-17小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时，他的工场已初具规模。<sup>[21]</sup>

前文提及的胡克林在大战后期的经历，也是欧洲华侨在艰难环境中仍努力谋求发展的又一例证。1943年初，胡克林在法国北部的德军军事基地已干了一年活，实在熬不下去了，无奈中，决定回到曾经生活过多年的荷兰另谋生路。胡克林回到荷兰后，找到温州同乡薛大贵，从后者那里，他得知由于德国法西斯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造成市场上服装等消费品奇缺，薛大贵正在做服装买卖，生意还不错。胡克林于是就给薛大贵当上了帮手。经过一段时间胡克林发现，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市民普遍对货币失去信任感，反而对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感兴趣。于是，胡克林看准机会，在一地以布匹换小麦，再将小麦运到另一地去换布匹，生活状况比起当苦力的日子，大为改观，并从中学到了不少经商的常识。胡克林后来认为，自己在战后能开餐馆，做生意，赚大钱，最早的基础就是在那几年打下的。<sup>[22]</sup>

二次大战期间仍然留居法国的丽岙华侨，在时局相对稳定后，又纷纷做起小贩生意。由于战争对不少城市的商业区造成严重破坏，集市小贩就成了居民生活的必要补充。当时法国的中小城镇都有固定的集市，时间不一，这就为华侨小贩们提供了较多的机会，他们带上货物，哪里有集市就赶往哪里，有些人渐渐有所积蓄。在此期间，丽岙华侨还在巴黎各区先后开办了六家皮革工场、一家丝巾批发商店。郑则贤等人于1940年10月在巴黎开办了一家皮革工场，可是不到半年就因皮源缺乏倒闭了，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气馁，一年后的1941年7月，他们又再度办起了一家新皮革工场并获得成功。

大战期间，在华侨中也出现了一些败类，他们或卖身投靠法西斯，或靠从事黑市生意发不义之财。荷兰的王一之即为其中之一。王一之于1934年到中国驻阿姆斯特丹领事馆任职，1935年被解聘后，留居荷兰，成为侨民。荷兰沦陷后，王一之卖身投靠占领当局。1943年，王一之竟宣称自己是当时中国南京汪精卫政府的代表，威胁荷兰华侨必须对其俯首听命。王一之声称他能够帮助华侨办理外出贩货所需的通行证，有办法代华侨申请减免劳役，还能代华侨申请得到保留收音机及交通工具的特许，他不仅以此为诱饵大肆向侨胞搜括钱财，而且借此拉拢一部分侨胞打击另一部分反对汪伪政权的侨胞。前文提及的“华侨互助会”被搜查、律师施锡仰被逮捕事件，据说就是因为王一之到德国占领当局那里告黑状的结果。二战结束后，在清查战犯、惩治卖国贼时，王一之被捕入狱，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此外，在大战期间，也有些华侨先是为生存需求铤而走险走私贩私，继而利欲熏心，靠从事非法生意大发不义之财。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是，有的华侨利用中国人与日本人相似的外貌，冒充德国的盟友日本人，骗取德国占领军的信任，或直接参与走私军火、毒品而暴富，或来回穿梭于德国与其它欧洲国家的边境，长途贩运各种战时紧缺物资以牟取暴利。必须指出的是，发了战争财的华侨只是极少数，一些西方学者抓住这些事例，认为欧洲华侨在

大战期间没有受到什么磨难，生活比当地人好，显然是以偏概全。

### 三 与欧洲人民并肩反抗法西斯

1936年7月，独裁者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的直接参与下，发动了反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叛乱。各国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为协助西班牙共和政府反击德、意干涉军和西班牙叛军，组织了“国际纵队”，于1936年10月正式赴西班牙参战。1937年10月15日，为深入战地总结西班牙人民阵线运动经验，同时也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全欧抗联组织了“赴西参观团”。该代表团在西班牙两周，先后访问了瓦伦西亚（Valencia）、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西班牙人民阵线”组织。全欧抗联的这一举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与欧洲人民团结与共的国际主义精神，并鼓舞了一些欧洲华侨加入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1939年3月，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后，部分中国人被关入监狱，有些随西班牙战友一起逃往位于法国南部的难民营，也有一些人回到中国参加抗击日寇的斗争。<sup>[23]</sup>

当德意法西斯将战火燃烧到欧洲大陆后，法国华侨有400多人主动参加到法国人民战时服务的行列。<sup>[24]</sup>在法国沦陷后，一些华侨仍然勇敢地与当地人民一起为反法西斯而战。旅法老华侨周亭和钱直向就是其中的两位代表。

周亭是浙江省文成人，1934年时，躲在从上海出发的一艘远洋货轮的底仓，历经半个多月的漂泊，到了意大利，后又于1936年到了法国巴黎，当过一段时间的泥瓦匠，后来又当街头小贩。法国沦陷后，周亭学着其他同乡的样子，也在家中开起了一家小皮革作坊，自制自卖皮带和皮革小钱包等。周亭的邻居是法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周亭敬佩他们，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周亭的家也成了反法西斯组织的交通站。为了掩人耳目，周亭与时常前来联络的法国女交通员日依尼也特装扮成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情侣。1944年，周亭的小作坊开始引起了德国占领军的注意。一天，德军以德国法西斯驻巴黎广播电台的头号人物被暗杀为借口，进行全城大搜捕。一听到这个消息，周亭立即赶去给反法西斯的法国朋友报信，他不顾个人安危，仍按原先约定的时间、地点去等候女交通员日依尼也特，并告诉她形势有变，不要再到他的住处去。可是，日依尼也特为了不连累周亭，执意同周亭一起到了他的住处，迅速销毁了她藏在那里的文件，并取走了存放在那里的手枪和手榴弹。日依尼也特刚离开没多久，德国鬼子就冲进周亭的住处大肆搜查，但没能找到什么可以栽赃于周亭的东西，只得快快离去。可是，一个月后，德国鬼子又发动了一次大搜捕，这次，他们不由分说就将周亭押上刑车。法西斯分子企图从周亭嘴里了解反法西斯人员的行踪，但遭到周亭的严词拒绝。连续十多天的严刑逼供，周亭的肋骨被打断了，遍体鳞伤，但他始终不吐一词。德国鬼子得不到他的口供，就把他押送到一个集中营监禁起来。几个月的非人生活，周亭的体重减轻了七公斤。可幸的是，当周亭在牢狱中度过第七个月时，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当年共同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法国朋友们没有忘记他们的中国朋友，他们特地到周亭的住处看望他，与他热情拥抱，为终于共同迎来了最后的胜利而欢呼！<sup>[25]</sup>法国政府为表彰周亭的功绩，曾发给他特别生活津贴，并向他颁发了奖状。

另一位法国华侨钱直向也曾在大战期间帮助过法国的反法西斯战士。钱直向1936年去法，曾担任过中华民国驻法的外交官，后长期旅居法国。1940年法国沦陷后，当时法国的社会党、激进党、共产党等组织了旨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民族阵线”。为了坚持长期抗德，“民族阵线”决定将部分抗德人工捐赠的经费存入瑞士银行，以备日后急需。民族阵线的秘书长找到钱直向、李石曾两位同情抗德运动的中国朋友，请他们设法将钱送入瑞士。钱直向

将一批金条、美元装在一皮箱里，乘火车上路。车抵瑞士，一出火车站，就看到德军正在一个个地搜查旅客行李，怎么办？如果被搜出钱款，不仅民族阵线来之不易的钱款将遭受损失，自己也有生命危险。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钱直向心里一横：我不是中国的外交官吗？我身上不是还带着外交官护照吗？何不理直气壮地出站呢？想到此，钱直向拿出护照，向德军晃了一下，竟顺利地通过了。他赶紧去了瑞士银行，将钱款如数存入，为法国的抗德朋友们保存了一笔可贵的资产。<sup>[26]</sup>

德军占领法国后，原法国下议院议长、著名的抗德战士艾里欧（Herriot）被德军软禁在维希，行动失去自由。钱直向和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刘先纬冒着被德军抓住杀头的危险，去探望这位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抗德战士。在寂寞、苦闷中度日的艾里欧看到两个中国青年来看望他，既惊讶又兴奋，双方倾谈一个多小时。钱直向和刘先纬临走时，艾里欧将一封给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亲笔信取出，请两位中国青年设法代为转交。当时，门外有德军暗探盯梢，商量再三，钱直向果断地决定将随身带来的手提包的夹里割开，将信藏在里边，尔后再将夹里缝好。出门时，两人若无其事，大大方方，德军看守随意看了一下就放行了。两人离开维希后，为了完成艾里欧的委托，立刻作了分工，刘先纬前往美国并与有关当局取得了联系，钱直向则设法找到当时的法国抗德武装反映情况。美法盟军经过研究后，决定营救艾里欧。不过，未等计划筹措完毕，盟军已开始全面反攻，艾里欧被德军押往德国本土，直到反法西斯战争获得全面胜利后，艾里欧才重新获得自由。战后不久，艾里欧在法国新政府里重新当选为下议院议长。虽然两位中国青年的营救活动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奏效，但艾里欧却没有忘记自己身陷危难时中国朋友的见义勇为精神。后来，当艾里欧庆祝八十寿辰时，曾邀请法国政界、军界、商界要人参加庆典，钱直向也接到了邀请。当艾里欧在祝寿的人群中看到钱直向时，立刻拉着他的手，大声地向全场嘉宾说道：“我被贝当政府软禁时，只有中国人来看我，就是这位钱先生！”全体贵宾报以热烈的掌声。<sup>[27]</sup>

当欧洲华侨陷于困境中时，不少人也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真诚相助。1945年10月，中国记者萧乾为采访纽伦堡公审战犯的新闻，顺道访问战后初期的德国。途中，他应邀到了一位青田商人的住处，见到了那位青田商人的德国房东太太，并听到一段感人的故事。在纳粹统治时期，这位德国妇人对纳粹的残暴统治敢怒不敢言，但是，她却冒着危险、不计损失，保护了自己的中国房客。在纳粹统治德国期间，那位青田商人“九年不曾搬过家，欠房租她也不赶，纳粹秘密警察逼她逐‘外国房客’，她也不理”，终于使那位青田商人比较平安地度过了艰难的战争岁月。当德国沦为战败国之后，这位德国房东太太出于人道主义的真情也得到了回报：“如今她的善举得了好报，她受到了中国国旗的保护！”<sup>[28]</sup>欧洲华侨与欧洲人民在共同反击法西斯的斗争中结下的友情，难能可贵。

#### 四 欧洲华人船员与反法西斯战争

在二次大战中，还有数以万计在盟军的商船、军舰上工作的华人船员，冒着德军空中飞机轰炸、水下潜艇攻击的危险，穿行于大洋之间，为盟军运送物资、弹药、兵员，甚至直接参加对敌作战，有的船员因所服务的船只被德国炸沉而不幸被俘，受尽磨难。1946年2月，中国记者萧乾曾访问位于瑞士的国际红十字会总部，在登记室的卡片中，他看到了关于“华籍俘虏”的材料，他们“大抵是由英、美沉船上抓走的海员。换言之，是欧洲战场的参加者。”<sup>[29]</sup>华人船员们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欧洲大陆沦陷之后，英国成为盟军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指挥中心所在。因英伦三岛本身资

源短缺，穿越大西洋的海上运输就成为英国坚持抗战的生命线。由于战时海上运输十分危险，没有多少欧洲海员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出海远航，因此，英国远洋公司以相当于战前华人海员工资三倍的“高工资”为诱饵，从中国招募了大批海员到英国利物浦港集结待命，总数多达两万人。<sup>[30]</sup>显然，华人海员已成为盟军海上运输的重要生力军。由于大批华人船员的到来，30年代大危机后已逐渐衰落的利物浦唐人街，在二次大战后期再度兴盛起来。

当时，在穿越大西洋的油轮上工作，危险性最大，故而被称为“死亡之旅”。大战期间，许多华人船员就在穿越于大西洋的油轮上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大战期间，华人海员因担任盟国海上运输而不幸遇难者，多达7000人以上。<sup>[31]</sup>

由于战时海员要冒着生命危险远航，因此，经过英国海员工会的据理力争，与英国政府的航运部签定了若干特殊的海员生命保障及赔偿协约，明文规定为英国工作的各国海员除领取每月工资外，还可享受如下待遇：（1）增发战时津贴每人每月5英镑；（2）如不幸遇船失事，海员衣物损失每份至少赔偿10英镑；（3）海员如不幸遇难殉职，遗孀每年可领取40-75英镑抚恤金，遗孤每人每周可领取赡养费5先令。

这些规定，对于赔偿人最宝贵的生命而言，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可是，即便此等补偿，也仅适用于英、比、挪、荷、波等国海员。英国航运公司以华人海员的工资已经得到提升为名，对华人海员的战时待遇另作规定：华人海员不能享受战时津贴；如果船只遇险失事，华人只能获得衣物赔偿费6英镑；华人船员如果不幸遇难殉职，只能获得一次性抚恤费总计港币1000元。换言之，华人海员所得衣物赔偿费只及欧籍海员的3/5，而抚恤费则甚至不及欧籍海员遗属终生抚恤金中一年的数目。1940年6月，英轮“皮鲁士”号被德国汽船击沉，有7名华人海员与数十名欧籍海员一同不幸遇难。善后待遇上的明显差别，引发了华人海员的强烈不满。当时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和海员协会驻英公会代表广大华人海员向英方提出平等待遇要求，经多方据理力争后，英方才勉强同意给华人海员每月发放3英镑的战时津贴。

1942年以后，随着中、苏、美、英等国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大大加强了，而中国人民长期浴血奋战、在亚洲战场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事实，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在此大背景下，世界各地尤其是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华侨要求享有平等待遇的呼声大大提高。他们强烈抗议各国对华侨的歧视，尤其强烈抗议对于亲身参加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华人海员实施不平等待遇。

人民正义的呼声加之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共同需求，促使一些西方国家陆续和中国签订条约与合同，逐步改变严重歧视华侨和华人海员的政策。1942年夏，先是英国政府同中国大使及华人海员代表共同订立了关于华人海员待遇的新合同，明文规定华人海员与英国海员享受平等待遇，提高工资，缩减工时，并保障华人海员的正当权利。接着，荷兰也与中国订立了改善在荷华人海员待遇的协定。1943年，美国政府废除《排华法》，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咨文中指出：“中国现在是我们的盟友了……废除排华法案，我们便可以纠正历史的错误，并堵塞住日本的歪曲宣传。”<sup>[32]</sup>美国政府的这一决策，进一步推动欧洲各国采取善待华侨华人的政策。

华人海员的待遇得到改善后，更提高了华人海员工作的积极性，尤其在大战后期，有些在盟军战舰上工作的华人船员，不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关键时刻，还挺身而出，充当舰上官兵的后援，赢得了英方有关当局的高度赞誉。英国战时运输部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华人海员守纪律，责任心强，虽然知识水准较低，但他们有强烈的国家观念，生活适应能力也



较强。而且，当敌人飞机空袭当头之际，华人海员不是抛弃本职工作畏缩一隅，而是勇敢地协助船上的炮兵射击敌机。该报告对华人海员在大战中的表现给与了高度评价。在众多参战的华人海员中，齐瑞、国泰、叶模扬、刘阿玉等四人因勇敢称职，功劳卓著，还获得了英王颁布的特别奖状。欧洲华人海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贡献，功不可没。

#### [参考文献]

- [1] [9] 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 1935 年的统计数据，转引自徐斌. 欧洲华侨经济 [M]. [台湾] 侨务委员会，1956. 5 - 6. 24 - 25.
- [2] [3] 章志诚，周福绵. 浙江省瑞安市白门乡人民移居欧洲历史与现状 [A]. 陈学文. 浙江省华侨历史研究论丛 [C]. 150 - 151. 154.
- [4] 章志诚. 丽舛镇华侨历史与现状 [A]. 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Z]. 32.
- [5] [8] Yü, Dembski (余德美). Chinesische studenten, Kaufleute, Revolutionäre in Berlin von den 20er Jahren bis zum Kriegsende (二十年代至二战结束时在柏林的中国学生、商人和革命者) [A]. 孟虹. 中国人在柏林 [M]. 40. 39.
- [6] Erich Güssinger. A Sketch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Germany: Past and Present (德国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A]. Gregor Benton & Frank Pieke. The Chinese in Europe (欧洲华侨华人) [M].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202.
- [7] [24] 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 侨务十五年 [M]. 1947. 转引自任贵祥. 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324.
- [10] 周南京.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872.
- [11] 仓心言. 飘泊欧洲三十载 [A]. 浙江华侨史料（第 5 期）[Z]. 59.
- [12] 章志诚. 艰苦创业的五十年记旅意侨胡昭卿 [A]. 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Z]. 136 - 138.
- [13] [28] 胡克林口述，1996 年 1 月 28 日，于温州。
- [14] [21] 龙海二. 一片丹心报国恩 [A]. 浙江华侨史料（第 5 期）[Z]. 49.
- [15] 章志诚. 热爱祖国，关怀桑梓记旅法华侨任岩松 [A]. 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 65.
- [16] 章志诚. 丽舛镇华侨历史与现状 [A]. 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Z]. 30 - 31. 三家百货店是：由张岩林等四人于 1933 年在马赛开设的百货批发商店，由郑振中等两人于 1936 年在巴黎开设的“振瓠公司”，由任岩松等四人于 1937 年在巴黎三区开设的百货批发商店。三家皮革工场是：由任新庚等三人于 1937 年在巴黎开设的一家皮革工场，由宋银者等人于 1938 年在巴黎开设的皮革工场，由郑锡楚等三人于 1938 年在里昂开设的皮革工场。
- [17] 据蔡则宣生前于 1988 年亲笔为笔者提供的回忆材料，原件未注明日期。
- [18] 李治华. 里昂中法大学话旧 [A]. 旅法华侨俱乐部二十周年纪念特刊，1972 - 1992 [J]. 76 - 77.
- [19] [20] [28] [29] 萧乾. 海外行踪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106. 209. 142. 209.
- [23] Joaquin Beltrán Antolin. The Chinese in Spai (西班牙华侨华人) [A]. 欧洲华侨华人 [M]. 215.
- [25] 顾林. 历经坎坷的周亭老先生 [J]. [法国] 欧华侨志 (试刊号), 1995 - 09 - 01. 周亭老先生已于 1993 年在法国去世。
- [26] [27] 钱直向忆二三事 [N]. 欧洲时报, 1986 - 08 - 23.
- [30] Douglas Jones, The Chinese in Britain: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英国华人社会的起源与发展), 第 400 页. 另据吴贵竹 (Ng Kwee Choo) 的研究, 当中国与英国结成盟国之后, 应聘到利物浦加盟英国船队的华人海员大约是一万名. 参阅 Ng Kwee Choo, The Chinese in London (中国人在伦敦), 第 7 页.
- [31] 刘伯骥. 美国华侨史 续编 [M].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1. 484.
- [32] 沈已尧. 海外排华百年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172.